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湖北红色历史文化数据库 > 抗日战争时期

革命史实

- 建党与大革命时期
- 土地革命时期
- 抗日战争时期
- 解放战争时期

武汉沦陷后的形势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

武汉沦陷后的形势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

(一) 日军对湖北沦陷区人民的残暴统治

日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追击下，纷纷溃散后撤。长江以南陈诚第九战区所属各军退至鄂南、湘北、鄂西一带；长江以北李宗仁第五战区所属各军撤至鄂西北沙市、荆门、钟祥、随县、枣阳及豫西南的唐河、方城、舞阳一线，其中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撤至荆门、宜城地区，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撤至襄樊、钟祥附近，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撤至随县、枣阳及河南唐河等地，汤恩伯第十三集团军退入豫鄂交界的桐柏山区，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军退留豫鄂边敌后。这些部队计约40万人，分别占据着武汉外围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华蓥山等主阵地。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机关已迁往重庆办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则先撤至宜昌，后移往恩施。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暂停对国民党军的追击，开始转向“警备态势”，以武汉为中心，沿着铁路、公路、长江、汉水推进，到处设据点，控制交通要道。溯长江而上的日军，止于岳阳，在监利县境的白螺矶构筑飞机场，与南岸岳阳成犄角之势，控制长江上游；沿汉江西进的日军，守于沙洋对岸，以确保鄂中占领区。此后，日军约7个师团常年驻守在以武汉为基地的湖北地区，企图把湖北变成其正面战场的近后方。其中，第三师团驻应山，第十六师团驻孝感，第六师团驻武昌，第十三师团驻汉口，第九师团驻蒲圻，第〇一师团驻岳陆，第〇六师团驻阳新。1939年1月，又增加了独立混成

团。这样，荆楚三千里大好河山，大部沦为日军统治区域。

日军在湖北所到之处，先是实行恐怖政策，敌机狂轰滥炸，敌兵烧杀淫掠，继而威胁、利诱沦陷区人民，成立伪组织，拼凑伪政权，并构筑碉堡，建立据点，划分交通线，实行残暴统治。

第一，对武汉及其周围城镇进行狂轰滥炸。空袭轰炸本是摧毁对方的军事设施，消灭对方军队的战争行动。但是，日军在湖北的空袭轰炸，却远远超出了这一限制。武汉沦陷前后，武汉及其外围的许多城镇，遭到了日机的野蛮轰炸、扫射，街道化为废墟，百姓倒在血泊之中。据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当时的抗战史料记载，武昌被炸30余处，死伤数千人；黄冈县城和团风、樊口等地1938年7月至10月被炸43次，死伤360余人，摧毁民房1100余栋；崇阳天成镇一次罹难军民达2000余人，其中伤兵医院800余名伤兵和医生、护士无一幸免。鄂中的应山、钟祥、荆门、天门、云梦等县被敌机炸死60346人。8月29日，日机56架先后三次轰炸京山县，炸死2000余人，伤3000余人。9月14日，蕲春县城遭日机轰炸，“城内外房屋楼阁自上午七时起至下午七时止，燃烧竟日，烟柱冲天，高达数十丈！是役，烧毁公有房屋13栋，民房200余栋，死伤军民500余人”。10月，日机先后出动109架次，对荆州古城及沙市、郝穴等沿江重镇肆意轰炸，共炸毁房屋537栋，炸死629人，炸伤的数以千计。荆州古城以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闻名于世，在日机的空袭中，东汉马融的降帐台、明代张居正的住宅、荆南书院等40多处古迹遭毁灭于一旦，无数珍贵文物化为灰烬。10月20日，应城西河渡口一带，有800余人惨死在日机的低空扫射之下。同日，由应城城关逃出的老百姓被炸死、炸伤的在300人以上。

10月23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搭乘“新升降”号轮船西撤宜昌，同船西行的还有上百名避难群众。当“新升降”号轮船行至燕窝附近江面停泊时，突遭4架日机空袭。轮船前舱首先中弹，当场死亡多人，继而轮船指挥台、后舱被炸，船体浓烟滚滚、火光熊熊，船上乘客惊叫哭喊，纷纷跳入江中逃命。敌机仍不放过，竟然又俯冲下来朝江面来回扫射，一些游在水中的、游到岸边的人，再一次遭到袭击。霎时间，血肉横飞，惨声凄厉，滚滚的江面上漂起了一条长长的赫红色的血带！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新升降”号惨案。在这起惨案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8人遇难，《新华日报》社16人牺牲，新知书店1人遇害，搭乘此轮死难的民众多则无法统计。

第二，对无辜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日军每占一地，都恶以各种手段抓来一些当地老百姓当众杀掉，以示军威，有时还将他们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在日军占领的湖北第一个县城黄梅县，日军一次就在县城西门口杀害了129名当地居民，其中30多户被杀绝。9月3日，日军清水联队在广济余川乡杀死无辜平民245人，杀绝25户。在大冶县董家鳌头，日军一次杀死平民42人。在黄陂王家河一次集体屠杀农民400余人（包括70多岁的老人和出生才3天的婴儿）。在武汉三镇，日军所设杀人场、埋人坑即有武昌大矶头、东西湖走马岭等10余处。位于汉口市郊的担教湖是日军行刑场之一，有长数丈、深四尺的埋人坑60多处，埋人4000余。据曾目睹日军杀人的当地农民说：“他们杀人，总是在头一天就把被杀的人带到这里来挖坑，第二天再把这些挖坑的人用白布蒙上眼睛，带到沟边强迫跪下，由喝过酒的日军挥起军刀照头砍一刀，不管死活，一脚踢进沟里，然后以黄土掩埋。”在湖北其他沦陷区，日军屠杀无辜平民的方法更是极其残忍，常用刀劈、枪挑、排枪扫射、挖坑活埋、投河溺死、“大卸八块”、狼狗撕咬、剜心剖腹、油泼水烫、勒食蛇蝎等手段。12月，在通城城厢乡嘴土屋，日军将王老应一家6口人一一捆绑在凳子上，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颈部放血于碗中，争相趁热狂饮。同月，在通城九岭的刘家源、下石井两地，日军将徐大贵、徐功欢两人用滚油浇淋烫死；在云溪乡将一位63岁的老人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更有甚者，日军竟然以杀人多少竞赛取乐。在黄冈林家大湾、定罗罗堰满等地，曾连续发生日军用集体大屠杀的方法比赛取乐的事件。

第三，大肆奸淫妇女。日本军官宣称：“奸淫妇女是日本军队所特有的。”因此，日军所到之处，凡见妇女，不问老幼，一律强奸、轮奸或脱光衣服当众侮辱。据史料记载，日军占领黄梅后，强奸妇女105名，其中30多名被轮奸致死。在广济余川乡，日军奸淫妇女329人。汉口沦陷的当日，3名日军闯进金城银行附近的一家商店，将店老板和他的小孩禁闭起来，轮奸其主妇。“时一区之三阳路、平

汉路空穿中之难民妇女，于敌军侵入之次夕，均被奸行。共和、鸿顺、永盛、清仁、厚福等里，被奸者数不胜数。”在武昌下新河，20余名妇女先被日军轮奸，后被日军用刺刀捅入阴道，杀死于山洞中。随县朱家大湾、孝感太子岗两个村庄的妇女被赶至稻场，脱光衣服，遭一个中队的日军轮奸，连7岁幼女和6旬老妪也未能幸免。据鄂南各县统计，仅在1938年10月至11月，咸宁、嘉鱼、蒲圻、阳新、通山、通城被日军奸淫的妇女就有2000余人，其中被轮奸致死致残的幼女、老妪在100人以上。日军还在武汉、鄂州等地设立海军公娼区、随军慰安所，掠夺青壮年妇女供日本军人任意蹂躏。1922年5月生于武汉的袁竹林老人曾回忆说：武汉沦陷后，我们几十个女孩子“被日本人以招工的名义骗到湖北鄂州，结果被带到了日本人的慰安所……我们每人分到一住房，大小约七八平方米。第二天，我就被10个日本兵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疼痛如刀割一般。过了一段时间，我怀孕了，心想，这样早晚是死，便暗中和一个老乡商量出逃，结果被发现，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孩子也流产了，从此还落下了头疼病……由于遭日本兵毒打，几乎每天都歪头疼”。

第四，设置据点，控制交通要道，进行疯狂的抢劫。日军一进入武汉三镇，立即封锁水陆交通，在市区增设设卡，全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他们撬门砸锁，穿堂入室，翻箱倒柜，进行公开抢劫。太平洋、磁宫、扬子江等饭店内的名贵字画和文物、财物被抢后搬上日舰艇运走，中山大道、交通路、江汉路等繁华地段的商店物资亦频遭洗劫。“武汉失陷之第三日，敌人开始大举搜括各银行之家具物件及特区私人财物，并没收其房屋”，他们“持日持斧拿锯劈人门户搜括私人财物粮食，偷逃行人获得五分之二亦被取去，若见负贩小菜之人必径搜括”，致使“武汉失陷四十日之中，除特区外，无砾遍地，商户均被捣毁，墙破壁倒”，“人们除上午购菜外，下午行人绝迹。五时以后戒严，路静人绝”。日军占领武汉后，还大量拆毁民房，强抓壮丁，为其修建防御工事。三五个人同时被抓、零星拆毁房屋者几乎每天都有，而抓了最多、拆毁房屋最多者仅在武昌就有三次：第一次是日军占领武昌后不久，即拆毁房屋上千间，强抓壮丁700多人，修建南湖飞机场；第二次是在武泰闸一次强抓壮丁400多人，开赴湖北，在长沙会战中为日军探地雷当炮灰；第三次是在徐家棚地区强抓壮丁2万余人，强拆民房几千间，修建徐家棚军用机场，致使“良田五千余亩化为荒土，居民三千余人流离失所”。此外，在鄂东黄冈、鄂中孝感、鄂南咸宁等地，日军为了维护点线防守，也大量拆毁民房，强抓壮丁，并设置劳务集中营，日夜赶修炮楼工事，其据点密度平均每15公里至30公里一个；对于来不及修建据点的地区，日军就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方法制造无人区。

第五，建立伪政权，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控制。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其后方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加紧在湖北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在《汉口方面政务纲要》中，日本政府陆、海外部大臣明确提出以“扶植治安维持会”和“获得帝国军队生存必要物质”为主要指导原则推行殖民统治。据此，日军很快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各沦陷区建立了傀儡政权和汉奸武装。日军进入武汉三镇后，即开始组织“维持会”，设立特工总部和宪兵队，收罗汉奸、流氓、恶棍和封建全道门头子，将武汉三镇划分为军事区、难民区、安全区，进行严密控制，镇压人民的反抗。汉口难民区在今硚口以下，利济路以上，左到汉江岸边，右至中山大道的地带，其周围只有两个门，一设硚口，一设利济路汉正街口。难民出入须持日军发的通行证，进出还得接受检查。武昌难民区，首尾两端木栅，每日上午9时开放，下午3时关门，整个难民区宛如军事监狱。1938年11月25日，湖北第一个具有伪政权性质的“武汉治安维持会”成立，计国桢任会长。1939年4月20日，在日军指使下，伪武汉市特别市政府成立，计国桢等“拥戴”张仁鑫任市长。此后不久，“武汉特别市政府武昌办事处”和“武汉特别市政府汉阳办事处”亦相继成立。11月5日，日军在华中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傀儡省政府——伪湖北省政府在武汉正式成立，汉奸何佛培为伪省长。随后，将武昌、汉阳两市区划归伪湖北省政府管辖，改“武汉特别市政府”为“汉口市政府”。与此同时，原国民党军第一八九师副师长李宝莲、第八十二师团长汪步青和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杨揆一等纷纷叛国投敌，与土匪头目金龙章、李太平等组织起名目繁多、系统不一的伪军。日军通过这些傀儡政权和汉奸武装，对湖北沦陷区进行严密控制。

第六，实行经济垄断，大肆掠夺湖北资源。日军占领武汉后，即以武汉为中心，开始有计划地对

湖北资源进行掠夺。一是掠夺农产品。武汉撤退时，集中在汉的大批物资来不及转移，均被日军掠夺走，仅大宗物资就有棉花120多万担、桐油700吨、牛皮2 000余捆（每捆300余斤）、生漆500多吨等。二是掠夺金属物资。日军强行以低价征购含有金、银、铜、铁、铅、锡、铝、锡等成分的钱币、器皿，或以盐、粮、火柴等日用品以及烟土、烈性毒品强行“交换”金属物品，甚至挨家挨户搜刮居民家中的金属物资。三是掠夺矿产品。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大冶铁矿区后，立即将铁山附近27个村庄全部烧毁，在方圆10余里的矿山周围安装6 600伏的电网，并在四周修起10余座碉堡，把矿区变成法西斯的集中营。11月，日本内阁正式决定把大冶铁矿委托给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经营。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在大冶成立日铁株式会社大冶矿业所，任命斋藤为所长。该所随后接管汉冶萍公司所属的大冶铁矿和湖北省建设厅所属的象鼻山矿（即官矿），进行掠夺性的采掘。四是对一切涉及战争的物资均实行统制垄断。日军一进入武汉，华中派遣军军部即规定：所有矿产、棉花、布匹、油料、苧麻、牛羊皮、猪鬃、桐油、生漆、笋壳以及粮食、食盐等一律列为军用专卖品或统制物资，除指定日本洋行代军部收购外，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在日本帝国主义超经济垄断高压下，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湖北民族工商业被扼杀、控制，原料短缺，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湖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日军占领武汉后还施行毒化政策，用鸦片毒害沦陷区人民。日军施行毒化政策，是从1939年开始的。为了掩盖其罪恶企图，日军美其名曰为寓禁于征，逐步减轻以至最后彻底杜绝烟患，但实际上是大量推销烟土和无限地扩大毒化范围。为了达到既毒害沦陷区人民的身体，又能为日伪政权增加税收的双重目的，日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把部分波斯土加工熬成熟膏，制成烟棒，并在包装纸上说明烟土的质量性能，以打消吸食者的顾虑，放心吸食；二是发放吸烟护照，凡是领了吸烟护照者，既可凭照按月向公卖处配烟土三两，又可向各土膏店购买官家烟膏，在家开灯自吸；三是扩大配售机构，将土膏公卖处扩大为汉口骑业公栈，即由原来的土膏店的股份组织变为官方的附属机构；四是扩大销售范围，不仅使武汉的土膏店和售吸所由原来的100多家急增到400多家，而且在湖北各地设立分设机构，直接向这些分设机构大量配售烟土，使湖北沦陷区各县的烟食者大增。日军实行的毒化政策，严重地摧残了沦陷区人民的体质和精神，致使一些人终日躺在烟床上吞云吐雾，日趋颓废与消沉，犹如坠入火坑而不能自拔。

日军对湖北的大规模侵略及其对沦陷区人民的残暴统治，实际上是剥夺湖北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湖北人民勇敢地站起来，以武力反抗日本的侵略。

（二）国民党开始出现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

日军占领武汉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还在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1938年11月底，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在南岳等地召开军事会议，将武汉保卫战后退到山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重新部署，划分新的战区。湖北及其周边地区分属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第五战区辖鄂北、鄂中、鄂东、皖西、豫南等地，指挥第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三集团军；第九战区辖鄂南及湘、赣部分地区，指挥第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集团军和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其中，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守鄂东北大别山地区，第二十二、二十九集团军驻守鄂北桐柏山、鄂中大洪山地区，第二十集团军驻守鄂南华蓥山地区，第三十三集团军驻守江汉平原。上述5个集团军所守地区，构成中日两军在湖北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国民党军利用湖北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区和湖泽地带，建立起防止日军继续西进的防御体系，将日军阻止在防御线之外，对日军的军事部署由抗战初期较为主动的攻守态势，变成只要日军不进攻就不主动向防御线之外进攻收复的态势。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在讲话中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抗战态度开始出现动摇，由比较积极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指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使国内团结抗日、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

开始发生逆转。

此间，在湖北地区国民党阵营内部，由于对民族矛盾和抗战前途的认识不同，也由于与蒋介石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存在着四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取不同态度的势力。

第一种是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为代表，包括鄂东、鄂中、鄂南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内的势力。他们站在蒋介石集团的立场一边，虽然还在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但在湖北及其周围地区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8年11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鄂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青等同国民党阳新当局谈判合作抗日事宜时，阳新地方当局突然袭击，残杀了刘青和大冶、阳新中共组织负责人及工作人员14人，制造了项家山惨案。12月，国民党崇阳县县长郎维汉捕杀中共崇阳县委和直属中队负责人3人。1939年元旦前夕，国民党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指挥、第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以“元旦团拜”的名义捕杀了咸宁第二大队大队长何襄楨。5月，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袭击中共鄂南特委领导的樊湖大队，致使该大队损失3个中队。6月，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袭击新四军设在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残杀了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正坤等6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第二种是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代表，包括在湖北的桂军、川军等势力。桂军、川军等大都参加过武汉保卫战，且同中国共产党有过良好的合作，此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但他们是国民党的非嫡系势力，同蒋介石集团有矛盾。撤退到鄂西北后，为了防止被蒋介石吃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欲利用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主、进步的旗帜，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1938年11月，李宗仁在筹备成立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时，对国民党人李范一、共产党人许子威等说：“抗战好比一道筛，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筛在一起，团结抗战，不能再分裂了。”但是，李宗仁等人只让共产党在自己的控制下开展活动，在群众中宣传自己所谓“进步”的一面，不允许共产党在湖北地区发展，尤其是不允许共产党在湖北敌后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当共产党的行为超出上述限度时，他们也会像蒋介石一样采取镇压措施。

第三种是以国民党鄂东行政督察专员程汝怀、鄂中专员石毓兑及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游击纵队司令曹勋等为代表，主要包括湖北地方封建军阀实力派等势力。他们虽然还在抗日营垒中，但基本不抗日，只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搞磨擦。为了反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有时甚至与日的军阀勾搭在一起。

第四种是以李范一、孙耀华等国民党开明人士为代表，是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他们抗日态度坚决，始终把全民族的抗战事业放在首位，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他们虽然不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认为双方在积极抗日这个基本原则上一致的，因而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

此外，在湖北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劣游杂武装。武汉沦陷前后，随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仓皇溃退，国民党的各级地方官员患上了严重的恐日症。他们一听到枪响，便带着携款而逃，政权系统因而大部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主、流氓、土豪、国民党内战时期的反共民团头子、乡村王侯和单莽英雄，纷纷打出乡村自卫的旗帜，拾捡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弹药，收容溃兵、流民，拉起一支支队伍。一时间，“游击队”遍于各地，“司令”多如牛毛，总人数约有10万之众。这些形形色色的游杂武装，有的沿用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番号，有的遁敌投敌。他们各霸一方，或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或者以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能事，抗日不足，殃民有余。

上述形势表明，武汉沦陷后，湖北地处中田战场的前沿、日本侵略军的近后方，存在着国民党军和日军两大军事势力的对抗。日军的暴行、国民党地方游杂武装的骚扰，使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日本侵略者的分化、诱降下，国民党开始出现反共妥协倒退倾向。但是，国民党军政内部又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取不同态度的多种势力。这种形势，给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提供了可供利用和发展的机会，预示着共产党在湖北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只能在日军和国民党军两大军事势力之间

的广大农村，特别是在敌后同各种势力进行艰难的周旋和巧妙的斗争，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

（三）中共中央中原局对湖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

根据武汉沦陷后湖北及整个中原地区的形势，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由刘少奇（化名胡服）、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华中敌后、战区和西南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党在湖北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后，湖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分别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发展党的组织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为重点，分片开展工作。

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即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中原局的领导成员、领导范围和主要任务。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郭述申、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为委员。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包括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党的工作。会议根据武汉外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经济、地理特点，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两个区党委，并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准备游击战争和支援敌后的斗争。1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委员朱理治、郭述申等从延安奔赴河南，传达中原局的决定，建立各地区区党委，部署和领导中原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2月24日，朱理治等人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随即在原河南省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向明、任质斌先后任副书记，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等为委员，辖豫南、鄂中、鄂北地区党组织。1939年1月，郭述申经豫东南、鄂东到达皖西后，在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白河水成立了由郑位三任书记，何伟、彭康、张劲夫、谭希林为常委，方毅、张体学等为委员的中共鄂豫皖区委员会，辖鄂东、豫东南、皖西地区共30余县的党组织。

1939年1月28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由延安抵达竹沟，主持中原局的工作。1月29日，刘少奇在竹沟主持召开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会议，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等14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朱理治等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以及当前豫鄂边地区的敌情、抗日游击战争的布置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介绍。然后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中原局发表讲话。刘少奇在充分肯定豫鄂边区党委开辟敌后战场的方针、任务和部署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扩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等问题。刘少奇指出：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敢于大胆地深入敌后农村，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是因为：第一，我们自己的队伍目前还十分弱小，如果与敌人打正规战，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敌后农村，变成革命的火种，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那力量就会大得多。第二，日军是异常强大的，国民党友军是昨日的敌人，虽然此时与共产党合作了，但总在找机会限制、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因此，如果老是夹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那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最主要的是，日军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和铁路沿线的交通要道，而广大农村则是日军统治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深入敌后农村，钻进日军的心脏地带，则能够给日军以最有效的打击。刘少奇还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们要敢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他分析了建立、扩大抗日人民武装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关系，指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才能向敌后发展；也只有大胆深入敌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才能真正坚持独立自主；舍此只能被国民党捆住手脚，只能成为他人囊中之物，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发展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会后，刘少奇与中原局其他领导人一起，全面规划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并就迅速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战略部署。

2月上旬，刘少奇在竹沟听取了钱瑛、王翰关于湖北省委工作情况的汇报，与他们一起分析了湖北地区的形势。鉴于此时鄂西北已成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鄂中大部已成为沦陷区，

日军正准备采取进攻鄂西北的战役性军事行动，中原局决定将豫鄂边区党委领导的鄂中、鄂西北地区划出，分别成立直属中原局领导的鄂中、鄂西北两个区委员会，以加强对湖北敌后和战区党的工作的领导。2月中旬，钱瑛由河南竹沟返回襄阳，向鄂西北地区党组织传达了中原局的决定。2月19日，中共鄂北特委在樊城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撤销鄂北特委，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王翰任书记兼组织部长，曹荻秋任宣传部长，张执一任统战部长，王纹中任委员，安天纵任候补委员。鄂西北区党委辖荆（门）当（阳）远（安）、均州、襄（阳）光（化）谷（城）、南（漳）宜（城）保（康）四个中心县委和襄樊近郊工作委员会，共有党员900余人。随后，钱瑛去鄂中，着手组建中共鄂中区委员会。24日，中共鄂中特委在随县长岗店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听取钱瑛传达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成立鄂中区党委的决定，随后在鄂中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鄂中区委员会，钱瑛任区党委书记（3月钱瑛调走后，由杨学诚代理书记），杨学诚任组织部长，陶铸任军事部长，夏忠武任宣传部长，盖纪常、王盛荣等为委员。鄂中区党委下辖天（门）汉（川、阳）中心县委和钟祥、京（山）应（城）、应山、应陆、枣（阳）南、枣（阳）北、枣（阳）宜（城）7个县委，以及随（县）北、随（县）南两个县委和随（县）西工作委员会，共有党员3400余人。

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西北和鄂中四个区党委的成立，初步克服了武汉沦陷后因各地党组织与领导机关失去联系而造成的不统一局面，为进一步做好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湖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